

# 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中的华员群体研究初探

## The Chinese Volunteers of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会议论文初稿，请勿外传）

徐涛

**【摘要】** 华商体操会组织于 1905 年“黎黄氏案”（又称“大闹会审公廨案”）发生之后，由虞洽卿等人发起，邀集华商百余人为董事，被公认为近代中国遍布各地的华人商团组织的鼻祖。传统中国“商”被贬为四民之末，总体而言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以会成立为标志，上海商界此后能够拥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力量，借以保护自己的切身经济利益，并代表商界参与一些重大的政治运动，这对于上海，乃至中国历史上的商人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变化。华商体操会具有典范效应，此后不久上海南市、苏州、汉口等城市遍布存在商团组织，成为清末民初的城市社会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就上海一地而言，华洋杂处的外国租界区域内，华人虽为市民，却始终未有“市民权力”，上海市政绝对控制在寓沪外侨手中。万国商团是上海公共租界的核心组织之一，肇始于 1853 年成立的“上海本埠义勇队”（Shanghai Local Volunteer Corps），多年间于上海地位十分显要。1907 年，经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批准，华商体操会签约加入万国商团，成为中华队。队员初为 83 人，后不断壮大。1932 年，又成立翻译队一支，独立编制。万国商团本是洋商自治、以在地中国人为假象敌的组织，中华队成立之后，华洋共存，性质为之一变。以万国商团中的华员群体为例，可见中西交杂、利益混合的近代上海城市历史中，中外之争并非零和博弈，在共同利益面前，常屈从于战争与和平的大抉择，共同支撑着国际社区的存在。中华队，以及随后出现的翻译队，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一个重要样本。

**【关键词】** 万国商团；上海；虞洽卿；中华队；翻译队；公共租界

**【作者简介】** 徐涛，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mail: xutao@sass.org.cn; [taochong1@gmail.com](mailto:taochong1@gmail.com)

绪言

1954年4月2日，一个星期五的晚上，在香港皇家游艇俱乐部（The Royal Hongkong Yacht Club）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晚宴。之所以称之为“特别”，是因为这场正式晚宴的举办是为了纪念一个远在千里之外的社团组织（即上海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的诞辰100周年，而它早在12年前即已宣布解散，不复存在。冠冕堂皇的高贵晚宴以及之后举办的板球比赛，如果简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那些追寻日不落帝国辉煌昨日的西方殖民者的怀旧之举，似乎并不值得特别注意。引起我研究兴趣的是，穿梭其间频频所见的中国面孔。这些中国人，他们是谁？是何时、为什么参加了这样一个社团组织？他们在历史上起过什么作用？而研究他们对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上海，有什么特别意义？

“商团”一词，并非“商人团体”之简称，译自英文 Volunteer Corps，特指近代中国以商人为主体的成立的一种准军事组织，源头可追溯到上海公共租界中的万国商团（Shanghai Volunteer Corps）。考上海万国商团，肇始于1853年成立的“上海本埠义勇队”（Shanghai Local Volunteer Corps），终结于1942年日本军队进入上海租界。89年间，万国商团相伴近代上海城市崛起，地位十分显要。<sup>①</sup>而与英国本土及英属殖民地（如南非、印度、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的商团组织不同，上海万国商团在历史演变中生出许多在地化的变形，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是为万国商团中华队（Chinese Company）的成立。

万国商团中华队，前身名为“华商体操会”，组织于1905年“黎黄氏案”（又称“大闹会审公廨案”）发生之后，由虞洽卿、胡寄梅、袁恒之等人发起，邀集华商百余人为董事，筹款组织，设备种种。1907年经工部局批准，签约加入万国商团。队员初为83人，后不断壮大，最终因二战爆发于1941年11月16日发布“复原令”，正式宣布退出历史舞台。

20世纪80年代初，近代中国的新式商人组织重新开始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但是经过30余年后，商会研究的成果蔚为大观，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而有关商团的论著虽然也有所增加，却远远不及商会研究。毋庸讳言，商团研究仍属于起步阶段，成果主要集中在20世纪初期广州、上海、苏州、汉口等地的华人商团组织于重大政治事件中所起扮演角色的外围研究，以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的研究论述最多。近年来，章开沅、朱英、李达嘉等人注意到了商团研究的不足，挖掘出版一手史料（如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团档案汇编》，巴蜀书社2008年版），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论著（如李达嘉：《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1905-1911)》，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

---

<sup>①</sup> 20世纪30年代末，万国商团已有相关研究面世，如 I. I. Kounin (Compiled of), A. Yaron (Illustrations by), *Eighty-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the Cosmopolitan Press, 1938（《万国商团的85年》，为史料汇编）；蒯世勋：《上海万国商团史略》，载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87-204页。

期上册；朱英：《近代中国商会、行会及商团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大大提升了商团的整体研究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迄今尚无万国商团有深度的专门研究，<sup>①</sup>除笔者外，<sup>②</sup>仅有张家昀和庄志龄 2 篇论文（庄志龄：《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多国部队”——万国商团》，《档案春秋》1997 年第 4 期；张家昀：《上海万国商团之研究（1854-1942）》，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82 年）。作为隶属上海万国商团之华员群体的学术研究自然更为罕见，既有论述多将其作为万国商团的组成部分一笔带过。

有关虞洽卿的诸多传奇或是个人传记中，“创建万国商团中华队”常与创办四明银行、南洋劝业会、三北公司等一起，作为虞本人一生的主要业绩加以收录。但可惜的是，虞洽卿的历史书写虽多，却鲜有学术佳作。最新关于虞洽卿重要研究著述，当数冯筱才的《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书中，主要援引《申报》资料，介绍了万国商团中华队前身——华商体操会创建初期的情况，并阐明华商体操会为“近代（华人——引者按）商团之滥觞”，“与后来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有莫大关系”，<sup>③</sup>而对华商体操会加入公共租界万国商团后演变为中华队的后续历史，却没有提及。

本文将研究对象锁定在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中的华人族群<sup>④</sup>：先是中华队，加之“一·二八事变”时从中分离出翻译队(Interpreter Company)，概述其发展历程，试析他们在的独特历史地位。

## 一、华商体操会之创设

1905 年 12 月 8 日，会审公廨上中国谳员关綢之、金绍城与英国陪审员副领事德为门(B. Twyman)对由川返粤途径上海的黎黄氏是否“涉嫌贩卖人口，该将押解何处”一节存在争议，双方坚持己见，僵持不下，言语不和演变为肢体冲突。庭审上华人谳员无端受辱于外人，引发上海国人普遍义愤，各类抗争示威不断，道台袁树勋据理力争，上海外国租界当局亦呈强硬立场，矛盾渐有愈演愈烈之势。

<sup>①</sup> 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后，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人编纂的《上海军事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1 年版）中有专门章节，概述近代上海历史中的万国商团。

<sup>②</sup> 徐涛：《侨沪武人：上海万国商团初探》，《文汇报》，2014 年 1 月 13 日；李光、徐涛：《上海滩上的“戴维王之星”——近代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研究》，《史林》2010 年第 4 期。

<sup>③</sup> 冯筱才：《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7 页。

<sup>④</sup> 20 世纪 30 年代末，万国商团已有相关资料面世，如 I. I. Kounin (Compiled of), A. Yaron (Illustrations by), *Eighty-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Shanghai: the Cosmopolitan Press, 1938*；蒯世勋：《上海万国商团史略》，载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 1939 年版，第 187-204 页。但令人遗憾的是，学界迄今尚无万国商团有深度的专门研究，除笔者外（徐涛：《侨沪武人：上海万国商团初探》，《文汇报》，2014 年 1 月 13 日；李光、徐涛：《上海滩上的“大卫王”之星——近代上海万国商团犹太分队研究》，《史林》2010 年第 4 期，第 44-51 页），仅有张家昀和庄志龄 2 篇论文（庄志龄：《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多国部队”——万国商团》，《档案春秋》1997 年第 4 期，第 72-74 页；张家昀：《上海万国商团之研究（1854-1942）》，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82 年）。作为隶属上海万国商团之华员群体的学术研究自然更为罕见，既有论述，多将其作为万国商团的组成部分一笔带过。

十天后的18日,事态严重恶化,最终演变为流血冲突:工部局率先下令对集会民众开枪,愤怒的人群围攻老闸巡捕房与南京路市政厅,并焚毁巡捕房“小房一间”,<sup>①</sup> 华人死伤30余人。<sup>②</sup>

公共租界并非殖民地性质,无任何国家军队常备驻扎与保护,虽主权归属中国,然而“差役捕拿盗贼,兵队巡缉匪类之权,华官不能有也”。公共租界的安全向来由工部局统辖下的巡捕警力和万国商团负责。18日事发当日,“工部局乃不惟不严加防范,且将巡捕撤回。暴动之日,清晨各店铺见商会传单,皆一律开市,以无巡捕保护之故,为流氓所胁迫,复相率闭门。所有团练兵(即万国商团——引者按),皆保卫西人住宅,置华人财产性命于不顾。”<sup>③</sup>

1905年初,一次外资银行买办的碰头例会上,<sup>④</sup>上海买办商人早有模仿租界万国商团制度,成立中华体操会的倡议。<sup>⑤</sup>“大闹会审公廨案”中,租界华商深受动荡之苦,持保留态度之华商纷纷转而支持,大大推进了中华体操会的成立进程。1906年4月,时任道胜洋行买办虞洽卿<sup>⑥</sup>、华比银行买办胡寄梅和花旗银行买办袁恒之为发起会长,邀集华商百余人担任董事,以上海总商会会长为名誉会长,筹得经费三十万两,以维护华商利益、保护租界华人为口号,成立华商体操会。<sup>⑦</sup>华商体操会“为全国之筹办商团者创”<sup>⑧</sup>,公认为近代中国各地华人商团组织的鼻祖。<sup>⑨</sup>

华商体操会之所以会在此时创设,除保卫华商利益、维持地位治安之现实需要外,另有两大历史背景,需要说明:

一是,“尚武救国”精神的体现。清中叶以来,外力冲击下,中国所遇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由商入绅或由绅入商者愈多,绅商间的界限渐渐泯灭。尤其是甲午战败以后,民族危机日深,中国人文精神上由“崇文”渐变为“尚武”。20世纪初,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鼓吹下,全国上下形成一股强大的军国民体育思潮,主张“尚武救国”,一时抗捐、抢粮、反教、反法、拒俄、抗美、抗英之风潮并起,民气之盛,前所未有。上海华商此时筹办体操会显然受此“尚武救国”精神

<sup>①</sup> “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沪道袁树勋致外务部梗电”,文安主编:《奇案写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8页。

<sup>②</sup> 关于大闹会审公廨案,学界已有丰富研究。参见褚晓琦:《袁树勋与大闹会审公堂案》,《史林》2006年06期;马长林:《大闹会审公堂案》,《上海档案》1988年第5期;彭晓亮:《关网之与上海会审公廨》,《史林》2006年第4期;章育良:《申报与大闹会审公堂案》,《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等。

<sup>③</sup> “袁树勋上江督节略(1906年2月)”,文安主编:《奇案写真》,第170-176页。

<sup>④</sup> 当时外资银行中的中国买办定于每星期三的下午,聚集在麦加利银行的买办间,讨论有关业务,互通信息,成为例会。

<sup>⑤</sup> 王凤山等着:《近代名商虞洽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sup>⑥</sup> “虞洽卿时为道胜银行买办(虞先是鲁麟洋行买办,后充道胜银行买办;他在道胜大约不到两年,即充荷兰银行买办。”参见赵晋卿:《对<虞洽卿的一生>的补正》,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0卷第3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01页。

<sup>⑦</sup> 参见蒯世勋:《上海万国商团史略》,载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87-204页;《上海华商体操会章程》,《申报》1906年5月18日。

<sup>⑧</sup> 虞洽卿:《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序,民国十四年一月华队公会刊行,第1页。

<sup>⑨</sup> 方椒伯:《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序,第3页。

影响，虞洽卿在1925年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成立二十周年时，追忆中华队创设之初的思想根源，言道：

夫国家之安危，系乎民气。民气之强弱，系乎学术。盖学术者，古今天下国家所寄托以安危者也。吾国侧重文学，偏废武术也久矣。民安其业，不知兵事，遇有盗匪烽警，率皆委之官吏，不敢闻问。强暴之加，既无自卫之能力；萑苻之扰，又乏互助之精神，致大好河山，黯然变色，完整神洲，分裂堪虞。爰本匹夫有责之义，联合同志，组华商体操会于沪北。<sup>①</sup>

“民智闭塞，国势孱弱，非振作尚武精神，无以资自卫而谋富强”<sup>②</sup>成为当时上海华商的普遍认识，故华商体操会创设之后不久，上海华商竞相效仿，设立体操会或体育部，继而成立商团。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上海“其时商团二十三起，会员二千外，枪支四百余”。<sup>③</sup>

二是，调和中西矛盾的需要。上海租界是20世纪排外、抵外运动的一个漩涡中心。“如何在这种政治氛围中，找到一个调和的办法，使华洋相对能够和平共处，便成为当时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擅长调和矛盾的虞洽卿，便是在这种情形下组建了华商体操会。这一举动亦得到当时上海华界官吏以及更高级别官员的支持，构成他们‘收回租界主权’或‘抑制洋人’的一条中间道路。”<sup>④</sup>

华商体操会甫一开始设备并未完备，会所设在南京路高阳里4号，操场就设于闸北华兴路、北浙江路的南北两块空地上（今浙江北路、华兴路的华安坊、华兴坊原址），据陈公哲回忆：“义勇队旧址，原为建筑简陋之平房，正房一连八间，间阔十一英尺，深二十英尺。前有走廊，左附工人室一，厨房一，厕所一，前有两操场。除第三四室拆通为练习室外，余室尽为宿舍。”<sup>⑤</sup>

虞洽卿聘请圣约翰大中两学毕业生陈既明、郑松生、徐通浩、石运干等担任华商体操会教练，<sup>⑥</sup>并且发动洋行、钱庄、银行、海关、商号等青壮年职员志愿参加。“开始时报名加入的颇多，后来看到要穿戴黄布操衣、操帽，大家又不高兴起来。虞洽卿和胡寄梅、袁恒之三人，就穿了那样的操衣、操帽出入大庭广众之间，如此，其他会员才不嫌制服的难看，每天参加操习。最初时会员二百四十人，每人每月缴会费一元，后来增加到四五百人。”<sup>⑦</sup>所有会员被“分为步兵四队、骑兵一队、军乐队一队，服装整齐，操练纯熟”。<sup>⑧</sup>

<sup>①</sup> 虞洽卿：《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序，第1页。

<sup>②</sup> 民国《上海县志》，卷13《兵防，商团》，第12页。

<sup>③</sup> 姚文枬：《李平书行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辛亥革命七十周年——文史资料纪念专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30页。

<sup>④</sup> 冯筱才：《政商中国：虞洽卿与他的时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sup>⑤</sup> 转引自张家驹：《上海万国商团之研究（1854-1942）》，硕士学位论文，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82年，第14页。

<sup>⑥</sup> 蒯世勋：《上海万国商团史略》，载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年版。

<sup>⑦</sup>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恽逸群文集》编选组编：《恽逸群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sup>⑧</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略绩”，第3页。

## 二、签约万国商团

与其他如雨后春笋成立之上海华界商团组织不同,华商体操会的成立,原本就是为了保护租界内的中国居民。<sup>①</sup>虞洽卿指出华商体操会“地临租界,势处特殊”,“盖租界住民特多,商肆林立,贸迁既盛于内地,华人尤多于外侨。彼旅沪各国商人尚知组织商团以自卫,而我大多数华人之居止营业于斯者,讵可不自奋勉,以组织我纯粹商民之自卫武力乎?”<sup>②</sup>

华商体操会成立后不久<sup>③</sup>,虞洽卿、袁恒之以“既同居租界,自亦负有保护界内商民之天职”<sup>④</sup>为由,致函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提出申请将华商体操会加入万国商团,表示愿意谨守规则,服从指挥,“合力保护租界”。<sup>⑤</sup>

然而华洋之间刚刚爆发流血冲突,“上海的绝大多数外国人,对华商体操会成立的动机和目标,表示出极大的不信任。作为一个独特的军事组织,她的总部就设在租界边缘,这将会大大增加租界与中国当局发生摩擦的机率。最近的事件(即“大闹会审公廨案”——引者按)表明,任何紧急情况时,外国租界中的所有武装力量必须受工部局当局直接统领,此时的战术布置不应考虑任何中国人可能提供的帮助。”与此同时,该文也谈及如今华商体操会的兵士“精力强壮,操法整齐”,“今上海华商团练队进步之历史,已经为全国所注意”,不能忽略的是,“租界内一部分中国人的确与租界休戚相关,希望保卫这些与外侨共同的利益,是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所以华商体操会加入万国商团一议可行,但前提在于“强调‘志愿’精神”,“以制度和措施切实保障”中国人与其他外侨一样“团结如一(Omnia juncta in uno)”。<sup>⑥</sup>

公共租界当局没有拒绝万国商团中华队成立的理由,<sup>⑦</sup>则只能在“制度保障”方面下功夫,将其力量限制在可控的范围内。深思熟虑后,工部局对华商体操会另订章程,“有种种条件之束缚”。<sup>⑧</sup>当时沪市商民及中华队队员对此都非常不满,认为英人对我太歧视。“试办至一年之久,嗣因与租界诸事两歧,多方不便,(华商体操会——引者按)人数亦逐渐减少。”<sup>⑨</sup>工部局地位逐渐有利,条件日苛,最终虞洽卿表示妥协,<sup>⑩</sup>除了“队长须由西人担任”改为“队长先由西人充任”外,其

<sup>①</sup> 李达嘉:《上海商人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1905-1911)》,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2期上册,第191页。

<sup>②</sup> 虞洽卿:《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序,民国廿四年一月华队公会刊行,第1页。

<sup>③</sup> 1906年10月17日,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正式接到了虞洽卿、袁恒之要求入团的函件,并进行了讨论。参加上海档案馆编:《工部局董事会会议录》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65页。

<sup>④</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略绩”,第3页。

<sup>⑤</sup> 《上海华商体操会愿与西商团练联合》,《申报》1906年11月23日。

<sup>⑥</sup> The Chinese Volunteers, *North China Herald*, January 25, 1907.

<sup>⑦</sup> 潘明新:《上海万国商团及其中华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总第39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页。

<sup>⑧</sup> 虞洽卿:《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序,第1页。

<sup>⑨</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略绩”,第3页。

<sup>⑩</sup>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恽逸群文集》编选组编:《恽逸群文集》,第191页。

统领下的华商体操会几乎答应了工部局开出的所有条件，分如下五条：（1）人数自五十至一百；（2）队员须体面商人，与政界无关系，而体格健全者；（3）每人须有殷实商保；（4）队长先须由西人担任；（5）枪械、枪刺不得带回，用前领取，用后归库。<sup>①</sup>

1907年3月17日，发起会长虞洽卿与工部局在当时南京路市政厅签订83人入团之约。从此，万国商团始有中华队。<sup>②</sup>“约既签定，（万国商团——引者按）团长华生君<sup>③</sup>乃呈请工部局，授任向为海关队队长之柯毕特<sup>④</sup>为华队队长，行驶司令职权（柯君担任团练事务已十有七年，迨任为华队队长，遂辞去海关队队长，一意训练华队云）；葛雷烈<sup>⑤</sup>（葛君曾任印度防备团练会队长，抵沪以来，初在总司令部任事，继为爱字队队长）、水克<sup>⑥</sup>（水君原为海关队副队长，嗣参预南非洲战役得有奖章云）为副队长，其代理排长职务者则为华人石运干、徐通浩、胡筠秋、胡筠籛、金继扬诸人。此数君皆为华人中铮铮佼佼人力兼备、素具美誉者也。”<sup>⑦</sup>

### 三、争取平等之地位

上海万国商团虽然号称“万国”，然而在中华队成立之前，却一直没有中国人的地位。这一方面在于外侨在上海成立万国商团根本在为防御华人，对于华人是否能与其同心，切实维护公共租界秩序与利益心存疑窦，“招募华人加入万国商团绝非开创者所能想见”<sup>⑧</sup>，“中华队队员内心情感上存在冲突的可能性，使得中华队成立尤为困难。在签约保证之前，这种情感冲突必须克服”<sup>⑨</sup>；另一方面则是种族主义思想作祟。上海公共租界当局的大班们，乃至整个外侨社会或多或少都有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种族主义思想，对于中国人存有颇多负面看法，近代以来惯以不平等之态度待我。以上两点可以解释为何几乎同时加入万国商团，美国队（1906年1月17日）与葡萄牙队（1906年2月26日）则没有中华队上述种种限制与束缚。

中华队成立伊始，即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广东人黄勋伯为中华队的一员，任职于泰和洋行，寓居于虹口，1907年3月28日夜，因救援邻居，徒手捕盗，

<sup>①</sup> 蒯世勋：《上海万国商团史略》，载上海通社编：《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187-204页。

<sup>②</sup> 潘明新：《上海万国商团及其中华队》，第31页。

<sup>③</sup> W. M. Watson, 1903-1908年任上海万国商团总司令。1902年底，工部局向英国战争部（War Office）提出申请，由英国正式军官担任商团司令一职。华生，为英国战争部指派的第一位正式英军军官，英国陆军少校。参见 I. I. Kounin (Compiled of), A. Yaron (Illustrations by), *Eighty-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the Cosmopolitan Press, 1938, pp. 55-59.

<sup>④</sup> 英文名为 L.J. Cubitt.

<sup>⑤</sup> 英文名为 G. Grayrigge.

<sup>⑥</sup> 英文名为 R. M. Saker.

<sup>⑦</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略绩”，第4页。

<sup>⑧</sup> The Chinese Volunteers, *North China Herald*, July 27, 1907.

<sup>⑨</sup> The Chinese Volunteers, *North China Herald*, January 25, 1907.

被数名强盗刺杀而死。此一义勇行为，颇令工部局佩服。于是举行一盛大的国际性军事丧礼，搭建彩棚，举行公祭外，并发放礼炮、以音乐队及各国商团执绋，游行河南路、南京路、静安寺路至墓园安葬，观众达数十万人。<sup>①</sup>

另一件关键事件为中华队赛得“脑维斯”杯。射击比赛是所载万国商团记录中最频繁之活动，可见乃为团员们最喜爱之活动。射击比赛项目繁多，可大致分为“港际赛”、“团杯赛”、“队杯赛”及其他赞助比赛等。1909年10月10日，中华队成立后，第一次参与全团各队射击比赛，即为“脑维斯”奖杯（The Novices Cup）比赛<sup>②</sup>。当时各队之最多者为121分，而华队独得135分之成绩。中华队此次“脑维斯”杯比赛的参赛代表是徐通浩、石运干、胡筠秋、胡筠籛、金继扬、袁恒之、陆葆泉、刘绶荪、王芑侯、杨振骧等十人，由外侨司底华君给奖，备受中外人士之赞许。<sup>③</sup>

以上两件事件，使对外人对中华队观感为之一变。万国商团中华队签约时的5条束缚条件，除第2、3两条外，其他各条逐一作了更改：

1909年9月21日起，特准枪刺带回。“华队约章，枪械用后即须归库。本次迎旗，团长彭司君<sup>④</sup>见华队精神饱满，而枪械等件如未经修洁，殊形减色，因令此后得将枪刺带回，以资整理，而示敬意，此为华队领回枪刺之始云”；<sup>⑤</sup>

1916年7月16日，华员升授副队长。“团长屠鲁门君<sup>⑥</sup>呈请工部局批准，自本日起，徐通浩升授华队少尉队副之职，此为华员升任队官之初步。”<sup>⑦</sup>

1916年3月1日，由团长商准工部局华队得领回枪支。“本队入万国商团业经十载，各员遵章勤练，于三年前放得领回枪刺权，至此始将领枪保单注销，并另立章程，如后至少三年称职，身居公共租界，持枪须着军服；离申过一月者，须先缴总司令部慎藏妥处，逐日揩擦，每月举行阅枪一次，队长随时有收回全权。”<sup>⑧</sup>

1918年，称职第十一届本队自队长以下计169名。<sup>⑨</sup>此年一举突破签约时100人之上限，并长期保持团员增加之态势；

1921年2月10日，华员代理队长。“本队队长葛雷烈氏因病请假回国养病，

<sup>①</sup> 《时事新报》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老上海副刊”；杨涇伯《黄勋伯——万国团练中华队殉职的第一人》；以及《上海县志》卷21，义勇，黄爵镛小传。转引自张家驹：《上海万国商团之研究（1854-1942）》，第15页。

<sup>②</sup> “脑维斯”杯由租界外侨 Messrs. Kuhn and Komor 赞助所举办，为众多“团杯赛”之一种。Wright Arnold: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London: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 Co., 1908, pp. 424-425.

<sup>③</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略绩”，第6页。

<sup>④</sup> A. A. S. Barnes, 1908-1913年为万国商团总司令，时为英国陆军少校。参见 I. I. Kounin (Compiled of), A. Yaron (Illustrations by), *Eighty-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pp.67-70.

<sup>⑤</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略绩”，第6页。

<sup>⑥</sup> T. E. Trueman, 1915-1920年为万国商团商团总司令，时为英国陆军少校。参见 I. I. Kounin (Compiled of), A. Yaron (Illustrations by), *Eighty-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pp.73-77.

<sup>⑦</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略绩”，第12页。

<sup>⑧</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略绩”，第13页。

<sup>⑨</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略绩”，第14页。



所有华队司令一席呈请团长指令中尉队副徐通浩氏代理执行。”这是华人第一次出任中华队队长一职。徐通浩此一代理队长职务于是年 11 月 16 日葛雷烈队长休养完毕返回沪上而自动终止；<sup>①</sup>

1922 年 5 月 20 日，队长交替，徐通浩终于出任队长。“队长葛雷烈隐退，由团长呈请工部局委任华队中尉队副徐通浩自五月十九日起，升授上尉，任华队司令之职，此为华员升任司令之始。前队长葛雷烈氏久思隐退，华队以其功高任重，坚留连任，至去年决计隐退，以冀禅让后起，开闕创例。现经工部局许可，准其辞职，又复允华队之请求，委任葛队长团部华队顾问，藉以参议华队事宜。”<sup>②</sup>

1923 年 1 月 1 日，中华队队长徐通浩再度升任。“12 月 14 日工部局公报载称，1 月 1 日起，团部华队顾问葛雷烈恳请退隐，照准为有久役功勋，升授少校衔，并予享佩军服之荣兴，又华队司令上尉徐通浩调任团部华顾问，处理本团华事，团部之有华员为顾问，此为创例。华队中尉胡筠秋，升授上尉，任华队司令。”<sup>③</sup>

1924 年 11 月 28 日，华队军士调升团部职员。“奉团令华队常备射击上士王衍庆调入团部射击科办事，此为华队军士入团部办事之创端。”<sup>④</sup>

1928 年 6 月 28 日，改订口令。“华队入团以来，向用英国口令，于我华人殊多隔膜，前队长胡筠秋君每以未能改用华口令为憾，现虽隐退，但对此尤积极进行，今奉令改进者，实胡前队长之功也。”<sup>⑤</sup>

在会长虞洽卿看来，中华队“将前订束缚条件逐渐取消，得与各国队伍受同一之待遇，且华队操射成绩，每冠全团”，是他于外国租界当局采取渐进式争权运动模式的一大成功案例。他大赞中华队能“为安定闾阎、捍卫地方之信念所驱使，委曲求全，力争上游”，一直为取得与同团其他连队之平等地位，乃至华人在上海外国租界之平等地位而奋斗，终于使得租界外侨能“移其疑虑之观念，而为热烈之钦佩”，万国商团中华队“不独能博得国际间之荣誉，而参权租界市政种种，要亦间与有力焉”。<sup>⑥</sup>

#### 四、翻译队成立与最终解散

20 世纪一二十年代，中华队既在万国商团中争取到与外人之平等地位，从日常操练到动员出防，不但丝毫不输于外人，且无一不处于领先之地位。“数年来，先进诸队，已不多让。”<sup>⑦</sup>1925 年 1 月，万国商团总司令屠鲁门称赞中华队“其

<sup>①</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略绩”，第 20-21 页。

<sup>②</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略绩”，第 23 页。

<sup>③</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略绩”，第 27 页。

<sup>④</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略绩”，第 36 页。

<sup>⑤</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略绩”，第 47 页。

<sup>⑥</sup> 虞洽卿：《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序，第 1-2 页。

<sup>⑦</sup> 《万国商团华队招募预备员之缘起》，《申报》1925 年 1 月 3 日。

纪律之严明、军力之雄勃，固已有口皆碑，无思不服。”<sup>①</sup>另有多处外文文献<sup>②</sup>谈及中华队时亦是赞不绝口，可见屠鲁门之言绝非泛泛之外交辞令，而是有感而发，言之有据。

中华队此时在公共租界表现优异，冠绝全队，对常受歧视、还未有公平地位的中国商人而言，不啻是一项荣誉。所以上海租界华人青年每以能入选中华队为荣，“其入队之踊跃亦异乎寻常，故队额虽只百人，而预备队员则常得百数十人”。

③

一名华商青年欲想加入中华队须“第一条，德、智、体三育合格；第二条，执业住址均在租界内；第三条，由殷实华商行号盖章保证并须经理签字；第四条队员为实行效力者免收队费（此条表示入队队员仍需要缴纳一定会费——引者按）；第五条，填志愿报名保证履历等书送队候令”。以上五条，中华队要“调查以上各种事实”，“调查及格后检验体格”，而“取者候令受课，不取者退还各书，不给理由”。<sup>④</sup>“取得候令者”必须经过六个月的入伍训练，并通过学科：章程（英文），术科：射击、体操（口令为中文）之测验合格。<sup>⑤</sup>“毕课后，考试及格者补充正备，不及格者留下入下届预备或出队。”<sup>⑥</sup>中华队测验之淘汰颇为严格，每年入伍生招训百人，1922年合格者仅18人。<sup>⑦</sup>而“这就是中华队每次检阅都全员出席且保持矫健的秘密：因为如果有一人松懈了，还有许许多多的不曾懈怠的人将会顶替他。”<sup>⑧</sup>

正备、常备视为中华队的主力部队，其中正备为现役人员，“入正备须签约章，立志愿书”，“至少三年称职，每年照章完全毕课”；“正备满约后复有改充常备之资格”，减少上操、出勤等，但仍须“签约章”，“至少三年一等称职，每年照章毕课。”<sup>⑨</sup>此外中华队中还有后备、调备、特备等队员：后备队员为“正备满约者，得充后备，照章无庸操射，为他备援助”；调备队员是“已经满约者可调他备，但调动期为大阅以后（五月）正操以前（九月），非规定时期不能调动”；<sup>⑩</sup>特备是指“受特种训练，司专门职务，照章照约特别称职”。<sup>11</sup>

① 屠鲁门：《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序（译文），第1页。

② 参见 I. I. Kounin (Compiled of), A. Yaron (Illustrations by), *Eighty-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the Cosmopolitan Press, 1938; *North China Herald; Social Shanghai*, 等。

③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略绩”，第4页。

④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章程”，第11页；《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章程”，第78-79页。

⑤ 《中华义勇军考取新队员》，《新闻报》1928年5月12日。

⑥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章程”，第11页；《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章程”，第79页。

⑦ 中华队招募新队员之过程，参见张家驹：《上海万国商团之研究（1854-1942）》，第15页。

⑧ I. I. Kounin (Compiled of), A. Yaron (Illustrations by), *Eighty-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p.184.

⑨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章程”，第11-12页；《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章程”，第79-80页。

⑩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章程”，第12页；《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章程”，第80页。

11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章程”，第12页。

1931年1月28日夜，“闸北事变（又称‘一·二八事变’——引者按）猝起，酿成空前战祸。租界当局于是日下午宣布戒严，团长汤慕思<sup>①</sup>发紧急命令，召集各队分区设防，并与英、美、法、意驻军组织联防。华队动员者正、常、预、后备三百余人，经在租界边线最困难、最危险部分担任防务，并征募各界热心人士组织译员队，于各友邦驻军防线，专理译务，为中外军民消除隔阂，调和情感，是役，自紧急时期至停战协议成立时止，前后共历七十有七日，为本团有史以来未有之严重遭遇云。”<sup>②</sup>

1932年10月1日，翻译队正式成立。“按翻译队系今春沪战时，本市华商应募而成之集团，当时服务英、美、意各友邦驻军防线，为中外兵民任舌人工作，免除隔阂，融洽感情，颇着成绩。最近团长汤慕思氏以此项组织有永久设立之必要，爰呈请工部局核准，自十月一日起，成立为万国商团之一队，其队长一职委中华队队长陈时侠兼任，并升调中华队上士鲍咸镛、王廷魁为少尉队官，上士张尔云赠少尉，共同佐理队务，均于团令一二二号及一三三号发表。”<sup>③</sup>1934年4月28日，中华队共有“称职第二十七届自队长以下正常备计161员，翻译队第一届共32员。”<sup>④</sup>

中华队与翻译队虽然为隶属于万国商团的独立两支连队，<sup>⑤</sup>但两队由一名队长兼任，且常由人员调动往来，不能截然区分。如1934年12月12日，中华队兼翻译队队长陈时侠即“派上士王伯笙、吴继叔、吴寿文、徐绍楣中士，刘明善、曹思勤、叶仞千、钟玉亭、谢一汉、吴观荣等十员，兼理翻译队事宜，以资协助。”<sup>⑥</sup>

“一·二八事变”后，中日矛盾呈现愈演愈烈之势态，全面战争的阴霾一直笼罩在上海的上空。公共租界工部局深感万国商团当时的编制、战力已经不能应付日将到来的中日大战，随后有扩充万国商团为一“混成旅”的想法，“俾使充实周密，增厚维护治安能力”。<sup>⑦</sup>万国商团如若扩充至混成旅，中华队自然亦需要随之扩充兵力，升级为营级编制。改组为中华营的计划为合并现有中华队与翻译队，是营“包括华员各队，规定应有正备、常备、翻译、预备四队。”然而万国商团扩充至混成旅的因经费、人员等瓶颈一拖再拖，改组中华营的计划亦随之未能实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军撤回绝大部分驻华军队，万国商团中主力活跃分子也纷纷回国参战。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稍后，日军在凌晨攻击了停泊在黄浦江中的英国军舰“彼得列尔号”，将其一举击沉；美国军舰“威尔

---

<sup>①</sup> N. W. B. B. Thoms，拥有官佐勋章（O.B.E.）杰出服务勋章（D.S.O.）、军功十字勋章（M.C.），时任英国陆军上校，1931-1934年万国商团总司令。参见 I. I. Kounin (Compiled of), A. Yaron (Illustrations by), *Eighty-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p.6.

<sup>②</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略绩”，第59页。

<sup>③</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略绩”，第61-62页。

<sup>④</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略绩”，第66页。

<sup>⑤</sup> I. I. Kounin (Compiled of), A. Yaron (Illustrations by), *Eighty-Five Years of the Shanghai Volunteer Corps*, p.189.

<sup>⑥</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略绩”，第69页。

<sup>⑦</sup> 《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略绩”，第70页。

号”旋即投降，全部战斗在 20 分钟左右结束。日本陆面的攻击也十分顺利，未遇到大的抵抗，而迅速占领上海租界全境。公共租界之工部局一时尚未被消灭，但供职之英美人士陆续遭到解聘，万国商团暂时保留协助维持秩序。1942 年 9 月 2 日，工部局决议解散万国商团。<sup>①</sup>先于万国商团解散，中华队、翻译队等华员连队早在 1941 年 11 月 16 日已发布“复原令”，正式宣布退出历史舞台。<sup>②</sup>

## 五、结 论

万国商团中的华员群体，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提供了一个重要样本。

以 1907 年 3 月 17 日为时间截点，华商体操会加入上海公共租界万国商团成为中华队，与 20 世纪初上海华界成立的诸多华人商团组织在政治取向与发展轨迹上出现了分野，这也最终决定了各自截然不同的命运。在工部局的精心设计下，中华队队员签约，宣称：“租界设有事故，当服从图长命令，欣然负责”。<sup>③</sup>在种种章程的严格约束下，华商体操会从“良莠不齐”的、由“各行各业从业员，其中有教会人士，也有一般小市民”组成的一般华商商团组织，经过审查“净化”为与公共租界利益密切攸关的“正当华商”组织。<sup>④</sup>不似李达嘉所言，上海的商人对于政治革命认识在 1913 年二次革命时候产生转折。<sup>⑤</sup>公共租界万国商团中的中华队，早已自 1907 年 3 月 17 日签约加入万国商团之日起，即已与中国政治革命运动表示了距离。这种距离感最初主要表现在 1911 年辛亥革命中，<sup>⑥</sup>以及继后之二次革命、五卅运动等等。上海其他华商商团组织更为积极参与国家政治运动，辛亥革命中投效陈其美，完成上海光复，又参与江浙联军会攻南京，团员死伤甚众，甚至有赴援武汉者，最终亦为政治运动所吞噬、解体，二次革命后为上海镇守使郑汝成所解散；而走入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商团，逐渐融入了公共租界，与公共租界当局化为一体，对国家政治运动的起伏不再表现出极强的参与意识，而是专心于地方利益的保护与秩序安全的维系，最终随着 20 世纪四十年代公共租界的消亡而解散。

在当时外国租界华商看来，尤其在上海租界华商领袖如虞洽卿、胡寄梅、袁

---

<sup>①</sup> 《万国商团从成立到解散简史，以及万国商团解散后房屋、装备等物资处理的来往函件》，上海档案馆藏，档案号 U1-14-865。

<sup>②</sup> 申渊：《皇家陆军少校和他的后代》，香港五七学社出版公司 2012 年版，第 10 页。

<sup>③</sup> 英文版本为“and in the event of any trouble in the Settlement we shall be glad to do our share of the duty of protecting the Settlement under the directions of the Commanding Officer of the S.V.C.”参见屠鲁门：《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序，第 1 页。

<sup>④</sup> “后来参加万国商团，成员都属老板、小开，银行、钱庄、商店、工厂的经理或高级职员，以及洋行，海关的华员，颇多有身价的人士。”参见潘明新：《上海万国商团及其中华队》，第 111-112 页。

<sup>⑤</sup> 李达嘉：《从“革命”到“反革命”——上海商人的政治关怀和抉择，1911-1914》，《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3 期。

<sup>⑥</sup> 1911 年“八月十九日，武昌军民起义消息传播于上海。九月十三日，军警一律反正，上海遂告光复，但城厢居民陡闻惊耗，咸风声鹤唳，数日中争相迁避于租界者如潮涌，当时本队及各队立即出防，维持秩序，保护居民地方得无发生扰乱情事。”参见《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略绩”，第 8 页。

恒之、方椒伯等人看来，万国商团中的华员组织，“骥附列强”<sup>①</sup>，团结自律，“（一）既不阿附取容，亦不庞然自大；（二）不预问政治之更迭，仅知以维持治安为己任；（三）同人勉力筹维，基金日臻稳固。守此信条，始终不渝”，<sup>②</sup>“急起捷追，百折不挠”，突破原有外国人当局设置之不平等章程之约束，“博得中外无上之信仰，争回国际优越之荣誉，为地方谋幸福，作市民之保障”，<sup>③</sup>无疑是华人与外人手中争取权益的成功典范。这种在自治和法治精神下，在原有权力框架体系中，渐进式的争权运动模式，不惟在上海公共租界中适用，亦可为近代中国其他国人所学习。<sup>④</sup>

而这一渐进式争权运动模式，与是时先由国民党、后由共产党领导下的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激进革命模式显然存在着巨大差异，是对国家未来发展走势完全不同的判断。历史证明，前一种风驰电掣般的革命运动，虽然可诟病之处亦颇多，却事实上改变了中国，前有南京国民政府，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对于这种渐进式争权运动模式，自然不会抱有认同之态度：轻则将其忽视，不见载国家建构的历史书写之中；重则采取仇视的态度，认为他们是洋奴、走狗，具有反革命的阶级本质。

在笔者看来，洋奴、走狗，甚至反革命的历史评判，无视万国商团中华队自1907年至1941年三十四年的服务于上海公共租界华人，与租界外人争取华人权益的种种“爱国”举动，显然太过于偏激与泛政治化。但上海租界华人的这种渐进式争权运动模式的确限制颇多，在彼时候的政治环境中显然并无推广之价值。

万国商团，以及所下属之华员群体，虽然对中国政治走势没有显著影响，而对上海一城而言，尤其是外国租界的而言，的确具有莫大的历史意义。安全与秩序对一座城市发展的重要性，毋庸赘言。近代中国自承平至乱世，大地上遍布烽火、到处战争。中国许多城市不得不面对一次次的战争摧残，有时这种破坏甚至是毁灭性的。自1843年开埠之后，上海在近一百年时间里可谓是一座安全的“孤岛”，每一次城市的爆炸性发展几乎都伴随着中国其他地区的战乱，概莫能外。在近代中国连绵不断的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中，上海显得尤为重要。各种人才向这里涌来，无数游资在这里集中。安全与秩序是上海之所以能够成为上海的根本前提和保证。万国商团无疑是为近代上海安全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华员群体的存在，对于万国商团能否良好运作亦有决定性作用。对万国商团，尤其华员群体的探究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上海得以脱颖而出、一枝独秀的更为深层的历史成因。

<sup>①</sup> 袁有道：《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序，第2页。

<sup>②</sup> 虞洽卿：《上海万国商团中华公会之三十年》序，第2页。

<sup>③</sup> 虞洽卿：《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序，第1页。

<sup>④</sup> “吾国各地不乏热心国是、关心民瘼者流，当兹大局不靖，果能各尽其良，奋然兴起，亟谋民力之扩充，以为正义之后盾，则亡羊补牢，尚非为晚。”“窃尝论之，国势之兴替，全视国民团结力之强弱，设我国团体如中华队之壁垒森严，持久有恒，为地方谋幸福，增国际之光荣，则岂特竞美于一时？国家前途，庶有奚乎？”方椒伯：《上海万国商团中华队之二十年》序，第3页。

